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经济学家 茶座

总第十三辑



- 茅于軾 追踪钞票的周转
- 王东京 用经济手段治理文山会海
- 刘福寿 关于「红薯换汽车」的联想
- 梁小民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一)
- 张晓晶 樊纲：经济学界的「刺猬」
- 饮冰 京城经济学教育的各路诸侯
- 何帆 写在天则经济所成立十周年的边上
- 徐延辉 女性经济学家何以严重短缺？
- 邹东涛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和对策
- 熊秉元 以文会友
- 顾海兵 纳什热中的伪经济学问题
- 荣敬本 东欧改革经济学登陆中国之回顾

2003 · 3

53

山东人民出版社

“茶客”风采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改革、宏观经济模型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经济学家的“茶座”，吸引来各路“茶客”。有的喜欢碧螺春，有的偏爱铁观音。有的专喝国产茶，有的非外国茶不喝。更有那超凡脱俗的雅客，只要茶馆递来空茶杯，就能假设心目中特等好茶的存在，端起杯子有模有样地品尝起来。本“茶客”有个嗜好。告诉我这是农民自制的“雨前茶”，那是工人防暑降温的“一枝春”，我的味蕾就会自动比照大脑中的“内存”，批评这个不像，那个离谱。人家说中国茶和外国茶如何不一样，我偏要设在布拉格、布达佩斯、布拉提斯拉瓦喝到的茶与中国茶味道有多么相像。好抬杠的品茶习惯想改也难。

陈抗，1956年生。文革期间随父母下放到闽西山区的武平县，高中毕业后在厦门纸制品厂当了三年工人。厦门大学数学系77级，毕业后留学美国，获俄亥俄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和马里兰大学应用数学与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1年任职于世界银行中国局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研究小组。后来到新加坡，先后任教于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1999年接任南洋理工大学应用经济系系主任至今。曾担任新加坡财政部、贸工部等政府部门以及多家跨国公司的经济顾问。主

——陈抗



漏 (黎青)

F12-53
J648

脑力锻炼

●何一帆

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脑力锻炼，那就是学习经济学。

学习经济学的运动量很大。学模型、读文献、玩计量、查数据、搞调查、写论文，从初入山门，到艺成出师，至少要五六年的时间。如果你能够把经济学学好，就再没有什么苦吃不了的。而且经济学家还经常以苦为乐，比如有篇论文研究的是从16世纪到现在500多年来荷兰棉花市场的价格弹性，简直让人怀疑作者是否有自虐倾向。

学习经济学尽管很累，但是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大有裨益的。学科对人的性情影响非常之大，我疑心学过精神分析学，到了天安门广场连人民英雄纪念碑都不敢正视。可是，我没有听说过哪个经济学家发过疯。纳什可能是个例外，所以我始终不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学习经济学让人乐观而平和。经济学家相信“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在一定条件下，反而能促成社会公利的增加。尽管有“在一定条件下”这一限制，但是我已经觉得这是我见过的社会思想中最乐观的了。学习经济学，让人觉得所有的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而且这解决的办法不用我们煞费苦心地设计，只要承认人们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同时又善于引导人们的逐利行为就行了。经济学充满了机智，它让我们这些平庸的人们充满信心，并且快乐。噢，对了，差点忘了提醒大家：学习经济学要有足够的自知之明，因为经济学只适合智力中等、道德水平中等的人们。愤青学不好经济学，有雄心抱负的人学不好经济学，智商太高的人学不好经济学，爱心太多的人也学不好经济学。

不过，如果你学了经济学但是没有学好，仍然会有光明的前途。有个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改行当了演员，他叫施瓦辛格。

HAM34/15



经济学家茶座

(第 13 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副主编

刘德久

执行主编

詹小洪

责任编辑

董新兴

陈丹丹

何 帆 脑力锻炼/1

【国是我见】

茅于軾 追踪钞票的周转/4
王东京 用经济手段治理文山
会海/7
刘福寿 关于“红薯换汽车”的联想/10
谢作诗 裤子与飞机之争/13
孔繁来 农民收入三题/16
王玉霞 质疑“非典”高考加分/22

【学问聊斋】

张宇燕 简约之美/26
金 碚 经济人理性主义行为是
假设而非现实/29
宋一川 经济学研究会不会“关键
时刻掉链子”?/32
李中建 经济学研究:取向、形态及
品性/37

【茶座填字】

梁小民 茶座填字/41

【经济学人】

梁小民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一)/44
张晓晶 樊纲:经济学界的“刺猬”/54
韦 森 亚当·斯密:一个鲜为人知
的语言学家/62

【学界万象】

饮 冰 京城经济学教育的各路
诸侯/68
何 帆 已经是永远——写在天则经
济所成立十周年的边上/74
徐延辉 女性经济学家何以严重
短缺?/80
汪雄剑 徜徉在激情与理智之间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学经济学/87



【生活中的经济学】

邹东涛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
和对策/93

储小平 老板的一巴掌/98

辛向阳 四个版本兔子的经济
底蕴/102

郭梓林 火爆的,就是便宜的/105

邓聿文 金钱、感情与婚姻的

三角关系/110

【评论与随笔】

熊秉元 以文会友/114

赵晓 追忆星光下流逝的美好/117

王则柯 没有权衡取舍,就没有
经济学/121

张宏志 “看守者交易”与“雪糕
效应”/122

李文溥 错误的故事/125

【海外一瞥】

孙德圣 中国移民在加拿大/129

【学者专访】

柳红 行云流水——朱玲访谈/135

【并非抬杠】

顾海兵 纳什热中的伪经济学
问题/143

【旧事重提】

荣敬本 东欧改革经济学登陆
中国之回顾/151

王松奇 北宋为什么变成了南宋/156

【编读往来】

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图书销售
排行榜/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13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7

ISBN 7-209-03286-X

I.经… II.金… III.经济学

-文集 IV.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第066869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2060055-4901

E-mail:chazuo@eyou.com

发行部电话

(0531)2060055-4903 4966 4912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1/32开

5印张 13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0.00元



追踪钞票的周转

●茅于軾*

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之中,几乎每天都离不开钱。经我手的钱,不管是100元的,20元的,还是一角钱的,都会引起我的好奇。这张钞票在来到我手里之前,经过了哪些人的手?他们是什么原因把钱用出去的?又是谁得到了它?这个交换是公平的吗?他们的境况如何?命运如何?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幸福快乐。

有些钞票,破烂不堪。这些钱往往是从一个小城市周转来的。按照北京的标准,这些钱早该回炉了。但是在小城镇,它们还在承担着交换的重任,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外一个人手里。也有些钱刚刚从印刷厂出炉,印油的味道还没有散尽。他们往往是从大银行,特别是给外国人换外汇而发出来的。看来负责分配和回收钞票的人是很有心计的,他们把资源配置到最佳位置上。也许有人会批评他们,这些资源配置的前提是人跟人不平等,乡下人就该用破钞票,外国人就该用新钞票。这个批评绝对是振振有词的。但是你再想一想,因为钞票的印刷预算有限,破钞票没有足够的钱把它替换下来,只好留在市场上继续周转。既然不可能大家都用新钞票,总得有些人用破钞票,难道外国人用破钞票,乡下人用新钞票就公平了吗?这样一想,觉得也还说得过去。不过这个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心目中,人是分高下的,连用钞票都可以看出哪些人高人一等,哪些人又比较被忽视。

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确实有人比较过各个国家钞票的平均新旧程度。得到的结论是澳大利亚的钞票最新。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我也到过许多别的国家。澳大利亚的钞票确实

* 作者系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比较挺括、干净。当然,大家都喜欢用新钞票,但是这是有成本的。不等钞票用旧,就送去回炉,显然会缩短钞票的使用寿命,增加钞票的印刷成本。常用新钞票,政府就要增加开支,纳税人要为此付出代价。

一张钞票能够在市场上周转多久?平均有多长的寿命?我得不到人民银行的统计数字,只好猜测。记得红色新版 100 元钞票投入使用后,仅仅一个多月后,就能看到个别用旧了的钞票。说明个别钞票的使用寿命是不长的。平均起来看大概也不会超过两年。我国有一万六千亿人民币现金在周转。如果其中有一半是 100 元钞票,就是 80 亿张。如果每两年换一次,每张钞票的印刷费 0.5 元,一年的印刷费就是 20 亿元。13 亿人口平均每个人合 1.5 元钱。这还没有算面额 50 元及以下的钞票的更新费用,也没有算钞票印刷之后的运输、储藏、点数等等的费用。如果全部加起来很可能平均每人的成本达到 10 元,总量超过 100 亿元。这就是国家为老百姓提供用钞票的服务所要支付的成本。最后这笔成本是由老百姓所纳的税中支付。

这是一笔无形的开支。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国家所提供的钞票服务,但是很少有人想过,这种服务要花多少成本。现在这么一算,发现可不是小数目,每人每年大约要花 10 元钱。因为这笔成本没有直接让每个人来出,谁也不会关心它,也没有人去想一想怎样能降低这笔成本。

减少这笔开支的办法,首先是每个人要爱护钞票。比如使用钱包就能减少钞票的磨损。国家给每个人免费发一个钱包,以保护钞票,对国家(也就是对老百姓)来讲,都是合算的。由于钞票不断在周转,在自己的口袋里停留不了多久,所以不太关心如何把它保护好,如果是自己的固定所有物,每个人都会自动照顾它。其实,糟蹋钞票所造成的损失最后还是老百姓自己负担。可以说,爱不爱护钞票是一个人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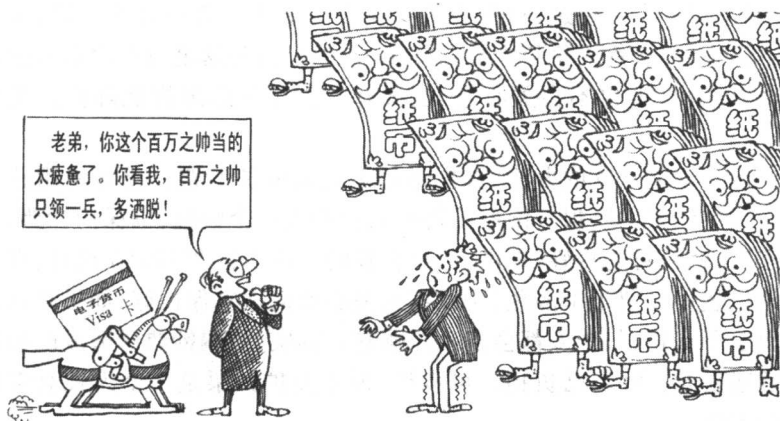
其次,政府应该发行 500 元面额的钞票。一张 500 元的钞票可以代替五张 100 元的钞票,印刷费用、运输、储藏和清点的费用都可以成倍地减少。比较其他国家钞票的面额,我国钞票的面额显然偏小。港币最大面额是 1000 元(约合 1000 元人民币),美元是 100 元(约合 800





元人民币),欧元是 500 元(约合 4000 元人民币),英镑是 50 镑(约合 600 元人民币),都比人民币的最大面额大好几倍。

最彻底的办法是使用其他支付手段,比如用信用卡、支票、电子货币。这些新的货币比钞票更优越。首先它们都比较安全,因为它们都是记名的,能够看得出是谁的钱、给了谁,不像钞票不记名,到了谁的口袋里就成了谁的财产,所以缺乏安全。其次,它的周转极快,当你收到一笔钱之后马上就可以用来支付给别人,不需要像钞票那样必须面对面才能付款,只要你的电子账户上有钱,就可以付款给自来水公司或电话局。再有就是节约了钞票的印刷费,而且避免了一张张点数,不需要钞票的运输和储藏,大大地节约了劳动和物质的消费。但是它要求有相应的设备和通讯联络系统,这个系统还必须非常可靠,即使碰到“9·11”那样的破坏也能够正常运作。特别是它也有特有的安全问题,比如身份的识别。现在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这些问题都能用低成本来解决。所以电子货币的推广已经势在必行,只不过人们还不太习惯使用它而已。



兵中新宠 (正侗 鲁风)





用经济手段治理文山会海

●王东京*

中国如今的会多、文件也多，人们称之为“文山会海”。虽是用词文雅，却又满含贬义。其实，早在20多年前，中央就强调要减少文件，转变会风。可时至今日，会风文风，却没有大的改观。你只要留意周边就会发现：有些人，平日里最反对别人开会，可他一旦开起别人的会来，却也神清气爽、乐此不疲；有人总埋怨上头文件发得过多，可经他下发的文件，也是连篇累牍、多不胜数。出现这种情形，官员们会说：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但如果站在经济学的立场分析，里头则有另一番道理。

官场为何热衷于开会？开会的目的，无非是要统一部署，协调行动。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也说，一个乐队，需要有一个指挥。指挥带领乐队演奏，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开会。可我们的问题

是，协调行动，难道一定要开会吗？在经济学看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须做成本分析。也就是说，是否开会，要看开会的“协调”成本。比如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开会；二是发文。倘若两者都能协调人们的行动，并且开会的成本高于发文，那么我们就应选择发文，而不是开会。可难点在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选择并非如此，通常的情况是，在发文与开会之间，大家往往更偏好开会。

倘真如此，那就说明上面关于成本的假定出了问题。事实上，开会与发文哪个成本更低，并无一定之规。按常理，开会的成本，一般要高于发文，但有的时候，发文的成本也会高于开会。如革命战争年代，当时我们队伍里工农子弟多，出身贫寒，少有念书，就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官至师参谋，可斗大的字，也识不得一筐。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要研究部署，下达命令，如果靠发文件，显然就不切实际。发文

*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件,不仅信息反馈慢,而且不能集思广益。再说,发文件也不可靠。某些当官的不识字,一纸文件下来,字都不认识,如何去落实?请教旁人,难免泄密;自己连猜带蒙,又担心张冠李戴、失之千里。所以比较起来,那个时候开会,是要胜于发文的,把会议精神都装进脑海里,既准确,又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开会的成本比起发文来,反而要低一些。战争时期之所以开会多,“成本低”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原来的革命党,已经转变为执政党,面对内战后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必须全力以赴搞建设。可经济建设需要文化,于是,中央发出号召,全党着手抓扫盲。如此春来秋去,几度寒暑,国人的文化素质终于有了大的提高。干部识字的多了,发文的成本就相应低了;再加上中国幅员辽阔,开起来,来回奔波不说,而且花钱也多,成本不菲。针对这种情况,决策层为了缩减开支,就想多发些文件,少开些会。照理讲,用发文件代替开会,本来是一项很“经济”的选择,可令人遗憾的是,文件是发得多了,但会却不能少开。

何以如此?个中缘由若用经济学解释,则是与“制度变迁”的成本有关。经济学讲制度,既包括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包括历史形成的习惯。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指出:制度是存在路径依赖的,改变制度,必然要有人支付成本。假若改变制度带给当事人的收益,不能大于成本,那么制度变迁就不会发生。发文之所以不能代替开会,道理正是如此。过去几十年,开会早已成为人们的习惯,如果不开会,官员不仅少了许多抛头露面的机会,而且也少了许多游山玩水的“收益”,这对当官的来说,都是他们的“成本”。正是这些“成本”存在,精简会议才遭遇了重重的阻力。

平心而论,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此多的党员,正常的开会,其实是必要的。中央所反对的,并不是正常的会议,而是那些过多过滥的会。可是,原本可以正常开的会,为何会演变成的文山会海呢?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官员要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具体一点讲,有三个方面:第一,开会可以减轻责任、规避风险。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是一把手工程,可一把手是人不是神,并无三头六





臂,有些事即使想管,却又无暇顾及。为了减少风险,于是就开会。只要会开了,文件发了,领导就算重视了,将来真的出现闪失,责任也会小些。第二,开会可以取悦上司、捞得政绩。领导讲了话,都会希望往下传达。及时传达领导讲话,既是对领导的尊重,也是自己抓工作的政绩。一石二鸟,何乐不为?所以每逢有领导讲话,下级就会层层传达,如此由点到面,一级传一级,这样会议开得多了,文件也就发得滥了。第三,开会可以张扬自己、获得名利。君不见现在各种媒体,整天都在报道会议。如此一来,开会就成了官员们宣传自己的机会。只要把主要领导请到,开会就会报上有文儿、电视有影儿、电台有音儿。打水运柴,莫非妙道。开会既然可以扬名,大家就自然要变着法

儿开会了。照此分析,文山会海是因官员们追逐私利所为,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从“利益”方面下力。几年前,中央就有明文规定,任何单位或团体,都不得在旅游风景区开会。最近中央又提出要求,各新闻媒体,都要减少对会议的报道。这些措施,对治理文山会海,无疑会大有裨益。但笔者以为,真正治本的方法,是要釜底抽薪,让乱开会者无利可图。比如,财政部门作预算时,要严控会议经费,对超标的单位要予以重罚;对到处拉赞助、搞摊派开会的,要视作违纪,严肃处理。同时,还应广而告之:今后考察干部,开会一律不算政绩,对那些巧立名目乱开会者,通通不予提拔重用。有了中央上述的规定,再加上这几条,上下联动,左右夹击,文山会海自当不治而愈!





关于『红薯换汽车』的联想

● 刘福寿 *

前不久,匆匆到欧洲跑了一趟,在我的脑海里留下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实质是农民问题。

200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27 510美元,我国人均GDP为7 081元人民币,按汇率法折算为GNI是840美元,我国与发达国家大约有32倍的差距。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法(PPP)我国人均GNI为3 940美元,也有约7倍的差距。但是,从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看,实际差距没有那么大。在欧洲,我问过一位在当地工作的同胞,他说一般“中产阶级”的月收入约为3 000~4 000欧元。回来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位德国的高级外交官月收入为4 100欧元,其妻不工作,另有一双女儿。这个家庭属典型的“中产阶级”,其日子已过得相当体面。(见《报刊文摘》2003年4月23日)

再回过头来看我国。在我国城镇中,可以称为“中产阶级”的月收入已不少于3 000~4 000元人民币。恰巧,手头上又有了一条具体资料。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位普通作者计算,他们这个三口之家的每月支出情况是:房屋按揭1 200元,一家人的生活费用1 500元,通讯费用350元,女儿的教育费用200元,交通费100元,加上送礼、赡养老人费用共需3 500元左右。(见《书刊报》2003年4月7日13版)虽然作者自己说这“只是小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我想,他即使够不上“中产阶级”,也绝对属于上中等收入的阶层了。这样,按购买力平价法,在各自国家的实际购买力1美元约等于1.8元人民币折算,中国的“中产阶级”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差距不会超过2倍。甚至,即使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一些主要城市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并不很大。上海2000年的人均GDP为37 382元人民币,按PPP法,折合21 053美元;北京

* 作者系河北经贸大学教授。





的相应数字是 25 300 元人民币(14 079 美元);天津的相应数字是 19 986 元人民币(11 122 美元)。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的情况大体与以上三市相似。粗略地说,我国城市与西方城市差距最大的是在城市风貌、历史底蕴、管理水平、文化消费、卫生环境、秩序观念等方面,如果仅就居民的吃、穿、住,家电的普及率、医疗保障等方面而言我们已不算很低。可是,我国城市中有中上等收入的人们并不觉得日子过得怎么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一是他们不知道外国的中产阶级们日子也过得很紧巴,很需要精打细算;二是自己的期望值过高,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当然,如果按照整个居民的平均数字看,差距会大一些。据统计,2000 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 280 元人民币。(注意:这个数字低于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法折算约合 3 500 美元,与发达国家的人均 GNI 有 7~8 倍的差距,如果与他们的“中产阶级”比,差距则在 10 倍以上了。我国城市中也还有一个为数不小的贫困群体,他们的景况确实还很窘迫,是需要整个社会加以体恤的。

但是,说到农民,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在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除了职业上的分工外,就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而言,全体居民已经“一体化”了。甚至在法国有明文规定,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要高于其他行业。而在我国,到 2000 年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36.2%,农村人口尚占 63.8%。农民这个有 8 亿之众的庞大的人口群体,其收入却很低。2000 年全国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的纯收入只有 2 253 元人民币,约为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 35.9%。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法折算,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也只有 1 273 美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有 20 多倍的差距,如果与他们的“中产阶级”比,其差距就有三四十倍之遙了。按国际统一口径,我国生活在每天 2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还有 53.7%,恐怕这主要是农民了。这应该是我 国国情中最严重的事实。

农民的收入为什么如此之低?人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 觉得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过大,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在欧洲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比国内市场上要高得多,如蔬菜、水果、服装、玩具、书籍等;而高档耐用品的价格又比国内市场低得多,比如汽





车、照相机器材等。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农贸市场，我看到蔬菜、水果的标价一般为每公斤 1.5~2.0 欧元上下。可能是在国内经常受到街头上烤红薯的香味的诱惑和媒体上关于红薯的好处多多的宣传的缘故吧，一份不起眼的红薯引起了我的兴趣，并使我浮想联翩。这份红薯标价为每公斤 2 欧元。而在国内的市场上，同样质量的红薯每公斤有 1 元人民币就足够了。马克思“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的著名公式使我想到，如果拿红薯去换汽车是个什么结果呢？在欧洲市场上，一辆中档轿车有 10 000 欧元就可以了。这样，有 5 000 公斤红薯足可以换一辆不错的轿车。5 000 公斤红薯，不过装满一小卡车而已。再来看国内。即使是汽车不断降价，一辆中档轿车也在 100 000 元人民币以上。就是说要 100 000 公斤以上的红薯才能换一辆轿车。100 000 公斤，就是一座小山！用 5 吨的卡车来拉，需要 20 辆，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如此巨大的反差，我国农民怎么受得了？

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由来已久，已经困扰了我们多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几次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但对中国来说，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工业化，要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它就是一只拦路虎。不过到底怎么解决为好，笔者不才，没有什么上策，只得留给政策学家们和决策者们去研究了。

说明：1. 国内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摘要 2002》，国际比较数据引自世界银行编的《2002 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口径是不同的，但为了比较的方便，忽略了国民收入不同概念的区别。

2. 由于美元和欧元比较接近，文中做了二者等值的假定。





裤子与飞机之争

●谢作诗*

我们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出口总值的80%以上,于是有人坐不住了,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低,我们吃亏了;我们拿1亿条裤子才换美国人1架波音飞机,这是吃亏了。他们还说,经济自由主义既误导了学生,又误导了政府决策层。

“拿1亿条裤子换1架波音飞机”是不是吃亏了呢?经济自由主义是不是既误导了学生,又误导了政府决策层呢?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事关我们国家产业政策方向的大问题。吃不吃亏的问题,徐滇庆先生很好地算了一笔账,比较优势法则也早给出了答案。比较优势法则告诉我们:每个国家应该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其比较优势商品,进口其比较劣势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商品总量增加,各国普遍得益。

比较优势法则只是表明一个国家应该按照比较优势贸易和专业化生产。然而,是不是一个国家不得不按比较优势贸易和专业化生产呢?一个国家可不可以不按比较优势贸易和专业化生产呢?比较优势法则就没有明确地给出答案了。

实际上,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能也只能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其比较优势商品,进口其比较劣势商品。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即使一个国家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较其他国家拥有绝对优势,能也只能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其比较优势商品,进口其比较劣势商品。

这就是相对竞争法则。相对竞争法则告诉我们:任何国家,不可能在每一种商品上都具竞争优势,但也不可能在任何商品上都不具竞争优势;任何国家,能也只能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其比较优势商品,进口其

*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





比较劣势商品。

徐滇庆先生讲：“美国的工资水平高。别看美国人连航天飞机都能做，但要他们把生产裤子的成本降到1美元以下，连门都没有。叫中国人制造飞机，造是造得出，但质量还过不了关。”言下之意：美国人能飞机却不能裤子，中国人能裤子却不能飞机。现在，让我来做一个极端的假设，看一看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假设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8人民币。假设美国和中国能生产同样质量的飞机和裤子；美国生产1架飞机的成本决定其价格为10亿美元，生产1亿条裤子的成本决定1亿条裤子的价格为2亿美元；中国生产1架飞机的成本决定中国飞机的价格为60亿人民币，生产1亿条裤子的成本决定1亿条裤子的价格为8亿人民币。这意味着无论是就飞机还是就裤子来说，中国都较美国拥有“竞争优势”。

但这种优势能够维持吗？不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会全面地进口，中国只会全面地出口，人民币汇率就要升值。比如上升到1美元=5人民币。结果怎么样了？现在美国在飞机上拥有竞争优势了，而中国则仅在裤子上拥有竞争优势——即使你在每种产品的生产上都拥有成本优势，汇率调节的结果，你也只能在相对优势较强的产品，即比较优势产品上拥有竞争优势，而必然地在比较劣势产品上处竞争劣势。

所以，我总在想一个问题：难道美国真的不想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吗？他为什么不可以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又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呢？因为在美国的资源禀赋条件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排挤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相对竞争法则在发生作用。

反过来，虽然我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愿望和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忘了，在现阶段我国资源禀赋条件下，市场力量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排挤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绝对不可以搞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是说一定要考虑条件和可行性，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比较优劣势和相对竞争法则的作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附加值高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这高附加值那是另外的事情！

我们搞了很多高新技术开发区，说搞得很“成功”。其实，我们的很

